



东西问

中新社北京1月12日电
作者 陶思远

眼前的他再也不是那个23年前初来中国的青涩留学生了。他操着一口地道普通话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就在大家为他标准发音讲中国话感到震惊之时，他竟吟诵起千古名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他说自己非常幸运，“因为此生能与中国结缘，近距离感受中国文学，以及中华文明的厚重……”他就是来自阿塞拜疆的阿格申·阿利耶夫(Agshin Aliyev)，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阿塞拜疆语教研室主任，已在中国生活20多年。

会背诵的第一首中国诗词是《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阿塞拜疆小朋友的绘画作品《敦煌佛光》亮相“艺汇丝路——丝路童心”上合组织国家儿童画展。李亚龙摄

阿利耶夫：“但愿人长久”里蕴含对天下人的美好祝福

20多年前，阿利耶夫还是阿塞拜疆一所高校的英语系本科生。2001年9月，他偶然得到机会到上海大学读书，由此对中国产生浓厚兴趣，于是攻读汉语言文学专业。谈起学习中文的经历，阿利耶夫对一件小事记忆犹新：“我曾参加过一次汉语比赛，当时有评委问一位选手，将来要如何向世界推广中文？那位选手的回答我很不满意。如果评委这样问我，我的答案是要通过翻译中国作品、研究中国典籍来推广汉语与中国文化。”

2016年，他从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出站后进入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工作，并倾注多年心血编纂了四部不同用途的汉语—阿塞拜疆语词典。为了学好中国文化，阿利耶夫还刻苦钻研中国文学，尤其喜爱古籍与诗词，“锻炼汉语发音最好的方法是朗诵诗歌”。苏轼的《水调歌头》是他最喜欢的作品。“刚来中国的时候经常能听到由《水调歌头》这首词改编的歌曲，当时，这首歌在留学生中间非常流行，但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这是东坡先生的名篇。我学习中国文学后才了解他这个人，这首词后来，它就成了我第一首可以用中文全文背诵的中国诗词。一转眼，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阿利耶夫尤其提到，更令他触动的是，作品中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蕴含着中国人对至亲、对朋友，甚至对天下人的最美好的祝福。

他也很喜欢杜甫的《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对仗工整，气势绵长。阿利耶夫还总结道：“中国诗词有个特点，读起来非常舒服。”“如果再有人问我要如何向世界推广中文，我会读这些诗词给他们听，这是多美的声音。”阿利耶夫补充道。

透过一句句词、一首首诗、一本本古籍，阿利耶夫在20多年的时间跨度中回溯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同时亲历了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见证了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中国文化逐渐“走出去”的过程。为了让更多阿塞拜疆人了解中国，他用近两年的时间完成《阿塞拜疆语讲中国文化》一书的写作，用母语勾勒出中华文明的脉络，揭示中华民族精神的要旨。他希望这本书能让更多阿塞拜疆人看到真实的中国，从而吸引更多年轻人成为跨文化交流的参与者。

第一次听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便想到孔子

“在撰写《阿塞拜疆语讲中国文化》之余，我还在翻译《论语》《道德经》。”谈及原因，阿利耶夫坦言，即便是在今天的阿塞拜疆书店里，有关中国的书籍依然很少。“你若问我哪本书最能代表中国文化，我觉得是《论语》，可在阿塞拜疆的书店里、图书馆里，我竟然找不到它，这只能说明中国文化至今没有‘到达’阿塞拜疆。”

阿利耶夫进一步解释，阿塞拜疆长期缺少汉语专业人才，所以也鲜有中国古籍的直译作品。“从前，阿塞拜疆人学习汉语只能通过第三外语，比如俄语或英语翻译成阿塞拜疆语的中国书籍。这些书里其实有很多因三种语言叠加造成的翻译偏差，为阿塞拜疆读者理解中国文化带来不少误区，所以我很早就想好好直译几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典古籍，让阿塞拜疆读者能直观全面地了解真实的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

预计整部《论语》的翻译工作将在今年夏天结束。”

在阿利耶夫看来，孔子作为全世界最受尊重的先贤之一并非巧合，《论语》中的很多思想至今启示着世界。他最欣赏“和而不同”(Harmony in diversity)的概念，“孔子提出的‘和’涵盖天人之和、群己之和、己之和。‘和而不同’追求的是在尊重事物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实现整体的和谐共存。也就是说，不要因为与我们不同，就不接纳彼此的文化。”

过去十年里，中国提出了许多具有世界意义的倡议，比如“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他说第一次听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民心相通”时，一下子就联想到了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当今世界，矛盾、冲突充斥着各个角落，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互不理解，互不信任。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说是孔子倡导的‘和’的现代表现形式，其深意是不同文明需要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因为今天各国的前途和命运是紧密相连的。唯有‘和’，大家才能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

“祝您的梦想成为中国”

近年来，在阿利耶夫的悉心培养下，中国第一批阿塞拜疆语专业的本科生已走出校园，并和他一起，为推动中阿文明的交流互鉴共同努力着。每当有人夸赞他当努力“中阿文化交流使者”时，他总是很谦虚地笑笑，在中阿两千多年的交往长河里，他说自己只是“沧海一粟”。

“大部分中国人和阿塞拜疆人对两国的交往史都很陌生。”说到这里，阿利耶夫惋惜地摇了摇头。据他介绍，两国的正式交往始于丝绸之路。阿塞拜疆位于欧亚交叉口，长期向东方输送产自西方及高加索地区的宝石、地毯、丝织品、天然染料、木制器皿等商品。与此同时，阿塞拜疆也向西方输送来自中国的陶瓷、调料、丝绸、玉器、水果等。直到现在，阿塞拜疆语的陶瓷器皿依旧被称为“Çini qab”，即中国器皿，中阿



阿格申·阿利耶夫，阿塞拜疆汉学家，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阿塞拜疆语教研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文化译研网(CCTSS)阿塞拜疆语专委会牵头人，“一带一路”青年汉学家联盟主席，阿塞拜疆卡扎尔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在古丝绸之路上的频繁往来可见一斑。“对当时的东西方商人而言，阿塞拜疆是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枢纽，更像今天的大规模‘物流集散中心’。”

提到千年前的中阿交往盛况，阿利耶夫笑了笑说：“那时候的阿塞拜疆人非常了解中国，也向往中国。商人们在丝绸路上贸易互通的背后，身处阿塞拜疆的知识分子也借此机会了解了丰富灿烂的中国哲学、中国医学、中国文学，乃至各类(秦)秦朝的秦。但其其实‘cin’的发音来自汉语，是汉语‘真’的音译。所以，‘Arzun çin olsun’这句祝福语翻译成汉语的准确意思是‘祝您梦想成真’。直到今天，这句话依旧是阿塞拜疆人最常用的祝福语之一。”

此外，古丝绸之路的两国文化交流也体现在15至16世纪阿塞拜疆的艺术形象上。在阿塞拜疆阿卜歇隆半岛的徐威兰村和阿格达姆市，考古学家们发现，古坟墓碑上刻有中国“龙”的图像，这充分说明阿塞拜疆雕刻艺术的确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与文学经典意象祥瑞兽——“龙”的影响。而16世纪阿塞拜疆画家苏丹·穆罕默德·塔布里兹、米尔扎·阿里·穆扎法尔·阿里、米尔·赛义德·阿里等也在他们的绘画作品中大量使用了与中国绘画纹饰或技术有关的元素。

“为了促进商贸、加强交往，阿塞拜疆始终全力支持着丝绸之路的基础建设，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因为丝绸之路在历史的长河里，真切地繁荣了阿塞拜疆”，阿利耶夫说。去年夏天，阿利耶夫入驻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坦白讲，这里给我提供了很大的学术发展空间。我也在这里翻译更多的中国文学作品，让更多阿塞拜疆人熟悉今天的中国。我了解我的祖国，阿塞拜疆文学界以及阿塞拜疆人对中国文学和中国的一切都十分感兴趣，缺少的只是汉语人才这座桥梁。于我而言，我愿意当这座朴素却结实的桥……”

陈士银：明代儒学对今天世界启迪几何？

中新社上海1月11日电
作者 陈士银 扬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综观中外历史，有三大微笑让人印象最为深刻：一是摩诃迦叶的微笑，这是领会佛教真谛的微笑，代表佛祖和迦叶师徒传承的默契；二是蒙娜丽莎的微笑，这是文艺复兴的微笑，代表民众走出神的光环，绽放人的魅力；而第三大微笑则是王阳明临终前的微笑，这是儒者的微笑，代表内圣与外王的结合及从心所欲的超越。明代儒学以王阳明为第一流代表，他既开创了足以匹敌程朱理学的阳明心学，又立下了平定宁王叛乱这盖世功勋，在整个中国儒学史上，王阳明都堪称内圣外王的完美典范。

“王阳明的微笑”背后有何儒学意义？

公元1529年初，王阳明弥留之际，露出一丝微笑，留下遗言“此心光明，复何言”。他既是一位儒者，又被奉为一代名将，这种全才在明朝乃至整个中国儒学史上都屈指可数。而其独创“阳明心学”则将儒学从僵化狭隘的程朱孔洞之中牵引出来，赋予它前所未有的空间与生机。

儒学本是文武兼备，知行合一，但到了明中叶，儒者普遍重文轻武、重知轻行。在他们心中，儒家的六艺之学萎缩成读书之学。王阳明在一次为言官仗义执言之后，被太监刘瑾追杀，后到龙场驿任驿丞。他为自己打造一口石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躺在其中感受死亡，思考人生，完成了“龙场悟道”，率先提出知行合一的学说。按照他的理解，当时儒者认为先要“知”才能“行”，但往往终身不“行”，也就终身不

“知”，而“知行合一”可避免知行分离之病。

王阳明儒学上的“知”和军事上的“行”桴鼓相应。他将儒家的仁义、诚信与兵家的杀戮、奇谋融为一体，从事儒学，便打开程朱理学的固化和局限，不适时代和现实的局面，阐明隐微的圣人之道与高妙的良知之学；他披甲挂帅，便平定积年盗贼，擒获反叛诸侯，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与明朝开国以来的儒者不同，王阳明对儒学的理解没有拘泥于卷册之中 and 口舌之上，而是返璞归真，从寻找本来的良知入手。乱世之中，面对不公，支撑一个人活下去的信念是什么？王阳明认为，单讲知行合一，观照范围犹有局限，“知行合一”大体是以儒者为主，而很多下层百姓、低级士兵，他们辛勤耕种、死不旋踵，哪一点输于吾儒？有没有一种可能，打破这些阶层的壁垒，解锁儒学的开放性，找到一种可以将所有人联系到一起的途径？经过反复摸索，他愈发感到良知是关键：“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出现奸佞小人？这就不能单讲良知，还需“致良知”。王阳明认为，人的良知一直都在，只是后天受到昏蔽，迷失本心。如果说程朱理学还带有浓郁的知精英的色彩，那么王阳明的良知之学则呈现出强烈的打通士庶藩篱的趋向。无论是知识精英还是不识字的百姓，只要能致良知，就能找回本心，乃至成圣成贤。

“儒学王朝”的强大生命力

何在？

有观点认为，儒学是为封建王朝服务的工具。可是，哪个封建王朝的存世时间与儒学相提并论？“儒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久的王朝，远迈唐、宋、元、明。即便最有力的统治者，比如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明太祖等人，也只能部分吸收或者利用儒学，就算有除去或消灭的想法，终究也无法打败或者消灭儒学。众多王朝的大厦竞相倒塌，而“儒学王朝”的基石坚定不移。秦汉以来，王朝的存在时间，少则二世而亡，多亦不过两三百载。儒学即便从孔子算起，就已绵延两千多年，这绝非出于偶然或者运气。

儒学之所以拥有如此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制定民族的价值标准，比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也不仅在于涌现一大批杰出的代表人物，比如郑玄、韩愈、朱熹、方孝孺、王阳明、顾炎武等，还在于儒学的不断自我革新，顺应时代发展的脉搏，比如汉、唐、宋、元的儒学各有各的表现形态，即便同一个王朝，明代前、中、后期的儒学表现形式都不同。

明初儒者多半是程朱理学的坚定信徒，几乎将程朱理学尤其是朱子学视为真理的化身。至于明中叶，随着阳明学的崛起，儒者再去固守程朱理学的旧知，很可能被视为迂腐。暨乎明末，很多儒者围绕在东林书院、复社周围，想要重整东林，而非做一个墨守朱子学或者阳明学的信徒。明亡之后，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既受到师承、家学的影响，拖着东林党、复社的影子，又对有明一朝的学术进行大反思，并提出诸

多具有民主色彩、革命色彩的言论。他们对君主专制的批驳，对民众福祉的关切，并不逊于同一时期的霍布斯、洛克等人。

17世纪中后期，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朱舜水等人的思想主张在当时的社会无法实现。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梁启超、孙中山、李大钊等思想巨子的发扬，这些明代遗儒的思想焕发出新的生机，给予世人推翻清政府的精神激励。退一步讲，如果说儒学是维护政权稳定的工具，那么儒学同样具有“汤武革命”的精神，促成腐朽政权的覆灭。看上去，封建政权利用了儒学，钳制了儒学，实则儒学自有顽强、坚韧的生命力。日月之光又何必与烛火争短长？烛火成灰有时尽，日月普照无绝期。

“儒学之光”如何影响世界？

既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为什么几千年来，儒学没有像世界上的诸多宗教一样，积极主动地向其他文明传播扩散？

自15世纪以来，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抑或从技术支持的角度，明朝都有能力探索乃至征服世界，包括东南亚地区、非洲海岸，甚至更远的美洲、欧洲。可是，这种做法并不符合儒家的主流价值观念。根据儒家的温和观念，“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而非“远人不服，遣舰队征服之”，更非“远人不服，变成奴隶贩卖之”“远人不服，传播病菌消灭之”。要之，儒家学说体系中没有扩张的基因。

但是，没有扩张的基因并不能保证本国免于沦为它国捕食的对象。虽然在16、17世



扬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士银

纪，西方世界的力量远不足以征服中国，然而东西方势力的对比差异愈发凸显。如果儒者依然固步自封，拒绝关注时代的发展和外部世界的动态，又如何能推动国家的发展？从万历皇帝，到徐光启、李之藻等儒臣，再到数量庞大的士大夫，不少人都领教了西方的舆图、船炮、自鸣钟、望远镜、天文仪器等器物的精妙，却几乎没人愿意派出一艘帆船前往大西洋一探究竟。其何以故？

在很多中国人眼中，这块土地太让人安逸了。既然我们已经处于最富强、最繁华的中心，又何必远涉重洋到几万里之遥的蛮夷之邦受苦受罪？

同时，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并非只源于某个人，而是国家之间意志较量的结果。如果没有西班牙、葡萄牙王室以及罗马天主教廷的强力支持，西方冒险家绝不可能开启“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利玛窦也极难谱写东西方交流的篇章。相较之下，明廷坐视本国两万多商民在家门口的海岛上被外敌屠杀(指明神宗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西班牙殖民者在吕宋屠杀华人)，尚且不能派遣一兵一卒，仅靠盛怒和谴责根本无济于事。西方汉学家彭慕兰

(Kenneth Pomeranz)提到，由于明清政府的“不支持”“冷漠”，以至于海外华商几乎得不到本国政府的保护，没有基本的安全感，更遑论去探索万里之外的新大陆。

此外，在我们拷问为什么儒学没有促成明清中国的“启蒙运动”之时，也不妨反问：启蒙的尽头是什么？

可能是更高层次的开放、自由、民主、平等，也可能是封闭、压迫、专制、不公；可能是更广泛范围的宗教宽容、和平共处，也可能是通过不断竞争、不断革命引发对世界新一轮又新一轮的瓜分与破坏。不容否认，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为人类开创新知，促进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社会的迫害、灾难以及战争并没有显著减少，反而呈现愈演愈烈之势。

回到17世纪中叶，无论朝代如何改名换姓，知识阶层想要改良社会，寻找路径，离不开对世界进展的关注(从历算、舆图、火炮等表层，到制度、思想、文化等深层)，同时也离不开对自身传统的尊重。尊重传统并非盲从传统，而是在此基础上理性地继承传统、厘革传统，从中开出新的生命。